

# 司礼监：明代宦官机构中的“出版巨头”

在明代紫禁城外朝与内廷的交界处，曾有一处机构既掌宫廷礼仪，又主文书刊印，它就是司礼监。司礼监位于今黄化门街南，现属于景山街道办事处管辖。由于明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以后，北京便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有趣的是，这位当年在北平府做燕王时，从未刻过一部书的朱棣，在当了皇帝之后，却对出版图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明成祖朱棣



## 经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机构

当时，官方的出版机构很多。比如司礼监、国子监、都察院、礼部、工部等部门，都有出版图书的记载，其中以司礼监、国子监、都察院刻书最多。但专司刻书的机构，就只有司礼监下属的经厂了。由于皇帝的支持，司礼监下属的经厂，工匠多达上千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在北京经厂所刻的众多图书中，最令人瞩目的有《永乐北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和《万历蕃藏》等辉煌巨著。这个原本只是宦官系统中负责宫廷礼仪的普通部门，最终成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官方出版机构，其兴衰历程不仅见证了宦官权力的起伏，更刻下了明代文化传播的独特印记。

明初洪武年间，司礼监的雏形已然出现。根据《明会典》记载，此时的司礼监仅“掌宫廷礼仪、纠察内官违犯礼法者”，职责局限于宫廷内部的礼仪事务，与出版毫无关联。朱元璋对宦官干政深恶痛绝，立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此时的司礼监地位低下，人员编制也仅有数人，远不及掌印、尚宝等监的规格。

司礼监的命运转折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宫中宦官曾为其传递情报、提供助力，他登基后便开始重用宦官以制衡外廷文官集团。永乐年间，司礼监增设“掌印太监”一职，负责掌管宫廷文书印信，同时开始涉足图书抄写事务——当时朝廷需要大量抄写儒家经典、宫廷档案，而外廷翰林院官员难以随时应召，司礼监宦官因常年在宫中值守，逐渐承担起这一任务。

真正让司礼监成为出版核心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设立“内书堂”，选拔十岁左右的聪慧宦官入学，由翰林院官员教授读书写字。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司礼监的人员构成，一批具备文化素养的宦官逐渐成长起来。宣德年间，司礼监正式设立“经厂库”，专门负责图书的刊印、校对与收藏，配备了专职的刻字匠、刷印匠、装订匠等工匠，最多时工匠人数达千人之多。

此时的司礼监出版已初具规模，刊印的图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用于宫廷教育

和赏赐官员。这些书籍刊印精良，用纸考究，被后世称为“经厂本”。与外廷国子监、礼部刊印的书籍不同，经厂本多采用大号字体，行距疏朗，印刷清晰，更适合宫中长辈阅读和远距离观赏，形成了独特的出版风格。

明中期以后，随着内阁“票拟”制度的形成，司礼监获得了“批红”权力——内阁大臣拟定的奏章需经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审核盖章后才能生效。这一权力让司礼监的地位急剧提升，成为与内阁分庭抗礼的核心机构，而其出版事业也随之进入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司礼监的出版范围大幅扩展，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涵盖了经史子集、宗教典籍、医药方剂、农业技术等多个领域。正德年间，司礼监刊印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三百余卷的巨著耗时三年完成，刻字工整，校对严谨，成为当时最权威的版本。万历年间，司礼监又刊印了《永乐大典》的选辑本，让这部旷世大典的部分内容得以流传。

## 经厂本以“量大质优”著称

司礼监出版的书籍中，不乏极具实用价值的典籍。嘉靖年间，为应对边境战事，司礼监刊印了《武经总要》《纪效新书》等军事著作，详细记载了武器制造、阵法布防等内容，为军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万历年间，司礼监还刊印了《本草纲目》的官方版本，由太医院官员与司礼监宦官共同校对，确保了内容的准确性，对医药知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经厂本以“量大质优”著称。司礼监掌控着宫廷的财政拨款，资金充足，能够选用最好的梨木、枣木作为刻版材料，纸张则采用江南进贡的上等宣纸。刻字工匠多来自苏州、杭州等地，技艺精湛，刻出的字体美观大方，

被称为“馆阁体”。刷印时采用朱砂、松烟墨等优质原料，使得书籍色彩鲜明，不易褪色。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年间司礼监一次就刊印《十三经注疏》两千部，除留作宫廷使用外，还分发给各级官员和藩王，影响广泛。

司礼监的出版事业还推动了明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提高印刷效率，司礼监的工匠们对活字印刷术进行了改进，采用铜活字印刷小型书籍，既节省了刻版时间，又降低了成本。同时，套印技术也在司礼监的书籍出版中得到广泛应用，如万历年间刊印的《闾范图说》，采用红蓝两色套印，图文并茂，成为当时的出版精品。

不过，司礼监的出版事业始终与宦

官权力紧密捆绑，这也让其出版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在宦官专权的时期，司礼监的出版成为巩固权力、打击异己的工具。

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把持司礼监，为宣扬自己的权势，他下令刊印《刘瑾忠烈传》，将自己塑造成忠臣形象，同时禁止刊印任何批评宦官的书籍。凡是涉及宦官干政、批评朝政的典籍，都被列为禁书，轻则毁版，重则追究作者和刊印者的责任。这种文化专制使得明代中期的出版业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态势，学术思想受到严重束缚。

万历年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合作，推行改革。为配合改革，司礼监大量刊印张居正编纂的

《帝鉴图说》《考成法》等书籍，向各级官员和宗室子弟宣传改革理念。这些书籍的刊印不仅扩大了改革的影响，也成为司礼监与内阁合作的政治象征。然而，张居正死后，冯保失势，这些书籍也被大量销毁。



吉安所明代司礼监所在地

## 秉笔太监刘若愚为保存古文献做出重要贡献

当时，宗教因素也对司礼监的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多位皇帝信奉佛教、道教，司礼监因此刊印了大量宗教典籍。明英宗时期，司礼监刊印了《大藏经》，这部典籍耗时十年完成，共六千余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佛教典籍刊印工程之一。万历年间，为迎合万历皇帝对道教的尊崇，司礼监又刊印了《道藏》，收录道教经典四千余卷。这些宗教典籍的刊印，一方面满足了皇帝的信仰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司礼监的出版活动也并非完全受权力操控，部分宦官出于个人文化追求，也推动了一些有价值的

书籍刊印。明末司礼监秉笔太监刘若愚，学识渊博，著有《酌中志》，详细记载了明代宫廷的制度、礼仪、生活等内容。他还组织刊印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为保存古代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礼监的出版事业在明末达到顶峰后，随着明朝的衰落而迅速走向终结。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加剧，朝廷财政枯竭，司礼监的出版资金大幅削减，经厂库的工匠人数锐减，图书刊印规模也急剧缩小。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逼近北京，朝廷陷入混乱。司礼监的官员们自顾不暇，原本负

责图书刊印、校对的宦官或逃亡，或被征召参与守城，经厂库无人管理，大量刻版被损毁或遗失。次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灭亡，司礼监作为官方机构彻底瓦解。

清军入关后，定都北京，对明代宫廷机构进行了大规模整顿。司礼监被撤销，其原有职能一部分由内务府接管，一部分划归礼部。经厂库剩余的刻版和书籍被清军收存，大部分刻版因年久失修或人为破坏而损毁，仅有少数被保留下来。如今，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收藏的“经厂本”，成为研究明代出版史、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司礼监作为明代独特的官方出版

机构，其存在时间长达二百七十多年，刊印图书数千种，涵盖经史子集、宗教、科技等多个领域，对明代的文化传播、教育发展、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它的崛起与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密切相关，其衰落则伴随着明朝的灭亡，成为明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由司礼监刊印的“经厂本”，不仅是书籍，更是历史的见证。它们见证了明代宫廷的权力博弈，见证了文化与政治的交织，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如今，当我们翻开这些泛黄的典籍，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司礼监工匠们的精湛技艺，感受到明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北京青年报